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蕭新煌 主編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蕭新煌 主編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台灣・台北

2011 年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蕭新煌主編；——
初版——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民 100.07
面； 公分

ISBN 978-986-02-8555-0（精裝）

ISBN 978-986-02-8556-7（平裝）

1. 客家 2. 文集 3. 馬來西亞 4. 新加坡

536.21107

100013573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

主 編：蕭新煌

編 輯：朱婷婷 簡心怡 歐錫富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782-2191；傳真：(02)2782-2199

印 刷 者：文盛彩藝事業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定 價：新台幣 500 元（平裝）

新台幣 600 元（精裝）

GPN：1010002301（精裝） ISBN：9789860285550（精裝）

GPN：1010002300（平裝） ISBN：9789860285567（平裝）

目 錄

第一篇、綜述

1.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
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 蕭新煌 3

第二篇、客家會館

2. 新加坡永定會館：
從會議記錄和會刊看會館的演變 黃賢強 33
3. 錫、礦家與會館：
以雪蘭莪嘉應會館和檳城嘉應會館為例 利亮時 65
4. 共進與分途：
二戰後新馬客家會館的發展比較 黃淑玲、利亮時 87
5. 新加坡茶陽（大埔）會館研究：
以文化發展為聚焦 王力堅 105

第三篇、客家聚落

6. 馬來西亞客家聚落的產業經濟發展：
以沙登新村為例 張曉威、吳佩珊 143
7. 馬來西亞柔佛古來客家聚落 安煥然 185
8. 馬來西亞雪蘭莪烏魯冷岳客家聚落 陳美華 221

第四篇、客家產業

9. 家族企業接班規劃：
霹靂州客家錫礦家族之興衰 李偉權 261
10. 族群政策與客家產業：
以新馬地區的典當業與中醫藥產業為例 張翰璧 289
11. 客家族群商業網絡的形成與變遷：
以馬來西亞太平中藥業為例 林育建 315

第五篇、客家宗教信仰與家庭

12. 馬來西亞客家族群信仰 張維安，張容嘉 339
13. 馬來西亞基督教巴色教會與沙巴州的
客家族群 黃子堅 367
14. 日常生活中的客家家庭：
砂拉越石山與
沙巴丹南客家家庭與日常生活 林開忠 403
- 作者簡介 445

Contents

Part I: Overview

1. Changing Faces of Southeast Asian Hakka: Ethnic Identity and Localizatio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3

Part II: Hakka Associations

2. Eng Teng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Examining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inutes and Souvenir Magazines
Sin-Kiong Wong 33
3. Tin, Tin Mine Owners and Hakka Association: A Study of Kar Yin Associations in Selangor and Penang, Malaysia
Leong-Sze Lee 65
4.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kka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fter World War II
Su-Ling Ooi and Leong-Sze Lee 87
5. A Study of Char Yong (Dabu) Association, Singapore: Focusing on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Li-Jian Wang 105

Part III: Hakka Communities

6.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akka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The Case Study on Serdang New Village
Siou-Wei Chong and Pei-Shan Ng 143

- | | |
|--|-----|
| 7. Hakka Community in Kulai, Malaysia
<i>Huann-Jan Onn</i> | 185 |
| 8. Hakka Community in Hulu Langat, Malaysia
<i>Meei-Hwa Chern</i> | 221 |

Part IV: Hakka Business

- | | |
|--|-----|
| 9. Succession Planning of Family Business: The Rise and Fall of Hakka Tin Mining in Perak
<i>William W. K. Lee</i> | 261 |
| 10. Colonial Ethnic Policy and the Hakka Business: Pawnshop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Straits Settlements
<i>Han-Bi Chang</i> | 289 |
| 11. Commercial Networks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of Hakka in Taiping, Malaysia: Its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Yu-Chien Lin</i> | 315 |

Part V: Hakka Religious Beliefs and Families

- | | |
|---|-----|
| 12. Religious Beliefs of Hakkas in Malaysia
<i>Wei-An Chang and Jung-Chia Chang</i> | 339 |
| 13. The Basel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Hakka in Sabah, Malaysia
<i>Danny Tze Ken Wong</i> | 367 |
| 14. Hakka in Everyday Life: Hakka Families in Batu Niah, Sarawak and Tenom, Sabah
<i>Khay-Thiong Lim</i> | 403 |

- | | |
|---------------------|-----|
| Contributors | 445 |
|---------------------|-----|

第一篇 綜述

1

東南亞客家的變貌：族群認同與在地化的辯證

蕭新煌

一、前言

客家族群從 19 世紀以來，因為開墾礦產（金、錫）經濟誘因，和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失序的推力，而有大量移民東南亞的外移現象。印尼西加里曼丹（West Kalimantan）、邦加島（Bangka Island）、馬來西亞（包括東馬）與新加坡即時成為重要的客家族群落腳之處。歷經西方殖民、民族國家崛起、後殖民與全球化的衝擊，東南亞客家族群的文化認同、生活方式與社會網絡更受到許多挑戰，因此客家族群在東南亞所經歷的變貌，如社會適應與文化認同的變化，應成為當前重要的社會學研究課題之一。

以往對於東南亞客家研究，比較偏向歷史文獻的整理和探討，如會館、義山、華文教育及早期移民史的分析。東南亞客家族群之所以作為一個被探討的對象，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似乎持續保留了相當多中國原鄉的文化特質，有些甚至比當下原鄉所發現的文化內涵還古老。另一方面因為與其他華人群體和當地其他族群的頻繁互動以及當地政治與宗教的特殊性，而必然會對客家族群產生許多影響和變化，也因此造就了它和留在中國原鄉和移往台灣的客家族群明顯差異。如果對東南亞客家社會文化變遷加以深入探討，相信會對闡述客家族群的多樣性有重要意義，特別是以跨國比較研究的視野來看，意義尤為凸顯。

「苗栗園區海外研究：東南亞客家研究先期計畫」是由行政院客

委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所委託進行的海外客家研究，由本人擔任總主持人，參與的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諮詢委員、國內外協同研究者共多達 15 人。本研究的策略是，分成五個研究主題切入，分別是會館、產業、聚落、宗教信仰與家庭；研究田野地點則涵蓋砂拉越（Sarawak）、檳城（Penang）、新山（Johor Bahru）、太平（Taiping）與新加坡等新馬有客家聚居之地（見圖 1）；研究方法則依循所有參與研究者的學科訓練，從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學等研究途徑，探討與詮釋東南亞（尤其是新馬）客家族群所經歷的社會文化變遷及其與「在地化」大趨勢的辯證關係。本書的 14 章中，有 12 章的內容是從此研究計畫結案報告加以修改而成，謹此說明。

有必要先做理論鋪陳的是：以「會館」、「產業」、「聚落」、「宗教信仰」和「家庭」這五個主題之所以可以做為探討新馬客家族群因應「在地化」趨勢所呈現社會文化變遷的可觀察變貌對象的合理性。身為東南亞的少數而特別的華人方言亞（族）群，客家在面對與主流社會及族群頻繁接觸後涵化或「在地化」的壓力當然是難免的結果。因此從「適應論」或「互動論」來分析和解讀新馬客家族群的社會文化變貌，當是可行的理論視野（莊英章 2001；蕭新煌、林開忠、張維安 2007）。客家做為一個亞（族）群與東南亞「弱勢」族群，在面對「強勢」馬來族群（在馬來西亞）或「多元」的華人族群（在新加坡）的互動接觸時，所產生的適應和變遷，必然會反映到若干重大的「制度層面」。這就是挑選上述五個制度領域做為觀察宏觀或微觀變遷的最重要理由。

會館既是瞭解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關鍵歷史線索，要探索客家的移民和適應過程及其變貌，當然得從客家會館的功能下手（蕭新煌、張維安、范振乾、林開忠、李美賢、張翰璧 2005）。所謂「族群產業」（ethnic business or economy）此一概念，近來一直被引用來解讀客家族群的經濟及企業經營制度性行為的窗口（張維安 2007a，

2007b)，循此去認識東南亞客家生計所賴和經濟網絡，誠為必要的一環。聚落或社區乃一族群成為一個社會體的空間基礎，從東南亞客家的聚落形成及其變遷，想必可以窺見相當豐富的社會與空間意義。至於宗教信仰（羅烈師 2007）和家庭（莊英章、羅烈師 2007）更是客家族群社會研究的必要內涵和對象，應該也是追溯和探訪客家族群在常與變之間，在深入其心靈、行為和制度之變與不變時，必要掌握的領域和指標。進一步說，要認識新馬客家的族群認同和族群關係，不能不掌握客家宗教信仰的特色和變化，以及客家家庭做為客家族群認同的養成基礎和進行多元族群互動過程的社會文化單位。

二、客家會館功能的歷史演變

在會館研究方面，本研究挑選了幾個代表性的客家會館，分別是新加坡茶陽會館與永定會館、馬來西亞雪蘭莪（Selangor）嘉應會館與檳城嘉應會館。客家族群大量移入馬來亞始於 19 世紀。同時，絕大部份都是獨自前來打拚，因此在精神層面與現實生活上，他們需要自己人的慰藉和幫助，而廟宇、會館也在移民的需求下陸續成立。廟宇與會館在當時的確曾扮演了精神層面和現實生活的輔導角色。之後，部份的廟宇與會館，更結合成為一個團體。

客家人與他們所屬的會館在社會扮演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變遷，會館功能和運作也不斷在調整。例如在 19 世紀初期，它是族群內的社區服務中心。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後，它的重要性也加強，它更成為維護族群文化、興辦教育的機構。在馬來亞獨立之前，客家人與其他華人一樣都是以當時的「中國」作為認同的對象，而會館更涉入「中國」事務，例如出錢出力支持國民黨的革命、北伐和抗日。而隨著客居國邁向建國的道路，客家人的認同也有所轉變，由「落葉歸根」轉為「落地生根」，會館乃積極參與當地的事務，既鼓勵同鄉申請成為公民，也幫忙同鄉申請，建國之後客家會館也儼然成為民

間的壓力團體。

從英殖民地到馬來亞，以及後來的馬來西亞，會館不斷調整腳步，其組織有著靈活性。當年，以商人為領導中心的會館組織，積極為會館置產，為會館的長久經營打下基礎。檳城嘉應會館與雪蘭莪嘉應會館，從性質上來看是相同，但是更仔細去觀察就會發現兩者的差異，原因在於兩地社會發展、族群結構和會館的領導層之不同。雪蘭莪嘉應會館從創辦至今，一直在許多從事企業的嘉應先賢支持下，為會館的發展打下了穩固的根基。至於檳城嘉應會館方面，由於嘉應州人在檳城的經濟力量與人口都處於劣勢（檳城以閩南人占多數），因此同鄉對於會館的支持乃有限。在這種情形下，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發展，更可看到兩所會館在發展上明顯的差別。

馬來西亞政府的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政策，都有著「種族主義」的考量，這使得所有華人處境都很不樂觀，尤其是華人內部的方言亞群。馬來西亞建國之後，政府照說應該是可以取代會館的功能，公平等待國內各大族群，會館亦可能隨之逐步消失，開始尋求轉型或退場。然而事與願違，建國後的政府與英殖民政府時代的華人政策，差別其實不大，對華人仍存有許多的不平等的待遇，這導致會館必須繼續負起照顧自己族群的額外功能。因此，馬來西亞的客家會館不但仍有存在必要，在族群教育、文化上還有其重要角色。

無論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客家會館都致力為鄉親服務，由於兩地環境不同，族群結構也略有差異，再加上經濟能力也有高下，使得兩地會館在發展上也呈現不同的規模。

以新加坡永定會館的建立為例，20 世紀初，在南洋謀生定居的永定人甚眾，但缺少一個團結和凝聚同鄉的統一團體，有鑒於此，永定先賢胡必育、張滋樓、胡星階等人開始發動籌備會館。1916 年 12 月 26 日在新加坡召開永定同鄉全體大會，成立會館的事宜獲得大會一致通過。經過一年多的準備，永定會館終於在 1918 年正式成立。

當年剛成立的永定會館實際上也是南洋各地永定同鄉的總會，在南洋大中小城市和地區，如：馬來亞、緬甸、泰國、印尼等地都設有協理。這些協理一方面參加永定會館的領導事務，另一方面則負責當地永定同鄉的聯繫事務。早期的永定會館不但是初來的新客生活安頓之所，也是異鄉遊子的鄉情寄託之地。根據胡冠仁的口述歷史資料：永定會館免費為新來的同鄉提供住宿，介紹工作；對年老的或被辭退的同鄉，會館則為他們買回鄉的船票，甚至送路費。此外，會館也幫助同鄉尋找親友，辦理出入境手續，傳達家鄉資訊，救濟貧病甚至安葬死者。由此可見，初期的會館幾乎可以滿足同鄉所有的社會需求，也因此成為一個凝聚力很強的民間組織。

1942 年日軍南進，新加坡淪陷。動盪的時局使大批鄉僑失業，甚至流離失所，永定會館又成為難民收容所，為同鄉提供棲身之地。新加坡光復後，永定會館立即投入重建。1945 年召開了永定鄉僑大會，更改會館領導階層為委員制，領導會員籌募資金修復會所，展開復建工作。於 1946 年 2 月出版《永定月刊》，這更是戰後南洋華人社團出版的第一份刊物，其特點為一份時事雜誌，除了報導會館動態及反映家鄉近況外，更積極關注國計民生等天下大事，並發表「旗幟鮮明」的言論，現已成為研究戰後華人社團活動和新馬社會變遷的珍貴史料。為解決永定家鄉僑育中學經濟上的困難，會館還發動同鄉贊助月捐，按月寄回作為學校開支。同時又捐建了校舍一座，名為「星洲樓」。戰後永定會館在新加坡復原和重建後，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1965 年新加坡被迫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建國，政治的變動也帶來相當巨大的社會衝擊，而這些變化對會館發展也造成直接的影響。新加坡獨立後，為穩定發展，政府乃積極貫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新加坡」的理念，強調國民認同和種族和諧。在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下，政府全面負責為國民提供教育、醫藥衛生、公共墳場等社會福利；為解決居民住屋，政府更興建了很多新鎮和組屋。在新建的組屋

區內，普遍設立民眾聯絡所、居民委員會等為居民提供多樣的活動來促進睦鄰和社區精神。在這樣急劇變化的大環境下，會館服務特定族群的原始宗旨與建國意識是不符的，會館服務鄉親的功能也幾乎已被政府不同機構全部取代。曾為華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的客家會館是否最終只能成為歷史遺物？

為了適應新局勢，永定會館乃重新定位自己的組織，它不再是南洋永定僑鄉的總會，也不再在東南亞各地設立協理員，它明確定位為一個服務新加坡永定鄉親的地緣性民間組織。其次，它也修改宗旨，從貫徹政府提出由華族各籍人士的「小團結」，提升到全國與其他種族大團結的目標。但是，這樣的重組並沒有為會館帶來實質的意義或效果，永定會館一時衰退的命運似乎難擋。

新加坡政府強有力的治理深化了國家意識和種族團結理念的進展，其中，以英語作為新加坡行政工作第一語言和教育制度的主要媒介語，更是新加坡政府的政策，目的是改造「國家認同」和強化經濟全球化。然而，它也催化了新加坡的西化過程，埋下被批評為「偽西方社會」的隱憂。為回應和面對此一困境，新加坡政府乃又回頭看看原有的價值和文化，從 1980 年代起，政府領導層乃開始根據文化特質，企圖建立新加坡國民的文化基礎。在這個「文化建立」的新過程當中，政府意識到會館所具有的潛力，1986 年 1 月 27 日「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成立，它集結了 185 個華人宗親會和會館，無異是凝結了一股強大的華人民間的社會力量。政府的目的很清楚，是要它肩負起發揚和傳承華人的傳統和文化，和推廣華語和華文的使命。此一宗鄉總會的成立似乎象徵著會館「終於」走過低迷的冬眠期，自許以新的社會文化角色重新走進新的歷史舞臺。

新加坡的客家宗鄉會館於是在功能轉型，開始積極投入較大範疇的社會參與。以茶陽（大埔）會館為例，除了繼續發揚樂捐助學的優良傳統，每年頒發「敬老尊賢度歲金」和「獎、助學金」外，還積極

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包括一些節慶活動，如國慶、會慶、春節團拜、春祭、端午節、重陽節、中秋節、教師節聯歡晚宴、客家飲食文化節等。茶陽（大埔）會館也進一步透過上述活動去加強與其他社群及外界社會的交流。它對於各地所主辦的世界客屬懇親會、客家文化研討會等等，也會組團參加，藉此進一步加強與各地客家宗親保持聯繫和促進鄉誼。從茶陽會館的發展過程更可見當年「館校合一」傳統的形成或許出於無心，卻形成了會館重視文化發展的策略結果。

因此，因國家發展而促使館校分離後，會館反而發展出更多元的功能，實踐文化發展策略的新使命。新加坡華人其他亞族群的會館近 20 年的發展，也有不少類似的活動成果，不過，在文教衛生事業以及文物館、文化研究室與圖書館的建設方面，客家的茶陽（大埔）會館確實做出了頗為突出和令人激賞的貢獻。

三、客家族群產業的興衰與演化：典當、中藥和錫礦

在東南亞客家產業研究此一主題上，本研究聚焦在探討典當、中藥和錫礦業這三種產業何以成為客家族群獨占的產業。本研究蒐集了英殖民時代族群政策與族群人口的統計資料，根據海峽殖民地的檔案資料（CO273 Straits Settlements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1838-1946）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當年馬來亞的客家人在 1921 年時，就以分佈在後來的馬來聯邦的州屬居多，占了客家總人口的 70%；而分佈於海峽殖民地與非馬來聯邦的州屬則分別為 17% 與 13%。再從各個州屬的華人總人口來觀察，客家人多分佈於玻璃市（Perlis）、雪蘭莪、森美蘭（Negeri Sembilan）與霹靂（Perak），各占了上述州屬華人總人口的 40%、33%、32% 與 30%。從客家人於馬來亞各州屬的分佈看來，縱然客家人的人口數量緊追在福建與廣府（州）人之後，但是客家人似乎較集中居住在鄉村或偏遠地區。換言之，海峽殖民地政府所採取各種族的「劃地分居」、扶植海峽華人經濟力以及引

進礦工等的政策，其實都間接或直接促使華人不同亞群空間分佈區隔化的現象。

馬來亞典當與中藥業中，英國殖民政府有意圖地把不同的族群安置到不同的經濟領域去經營相關的農、工業。在 1820 年代，華人（orang Cina 或 Chinese）勞工開始被殖民政府引進，許多華工都被安排到霹靂、雪蘭莪和森美蘭去當錫礦工人。在 20 世紀初，由於錫礦與橡膠在國際市場供不應求，英國殖民政府於是更大量引進來自中國與印度的勞工。來自中國的勞工也大多以契約勞工的形式安排到上述三個地區去。另外則有一部分的華人被分發去從事種植橡膠，或者到城市地區當技術學徒；不同族群之間出現職業區別的現象也在當時形成。同時，英國也採取了將不同族群隔離居住的政策，因此，華人大多居住在錫礦區與城市；印度人則大多居住在橡膠園；馬來人則大多居住在未開發的鄉村。

馬來亞早期的中醫藥機構多設立在有錫礦地區的州屬，其中雪蘭莪（包括吉隆坡與巴生，Klang）占了 11 間、霹靂與柔佛（Johor）各 1 間。馬來西亞早期成立中醫藥機構的單位除了祖籍會館之外，還有觀音閣、德教會或濱海佛學會等宗教組織。從當代的眼光看來，中藥產業（門市為主）與中醫（診所）縱使其經營內容相關，但仍應是兩個獨立的運作機構。但是在 19 世紀末當時，中藥與中醫的成立因素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雖然本研究尚無法明確證實中醫與中藥產業之所以會成為現今馬來西亞客家人「獨占」產業的原因，但是從已有的資料看來，18 至 20 世紀馬來亞的中藥與中醫診所與客家人的確有密切的歷史淵源，因為第一家藥店「仁愛堂」與第一間的中醫藥慈善機構「雪蘭莪榮陽回春館中醫留醫所」的創辦人都是客家人。

根據本研究在馬來西亞不同地區，包括檳城市區、檳城浮羅山背（Balik Pulau）、雪蘭莪加影（Kajang）、吉隆坡八打靈（Petaling）、馬六甲（Malacca）市區等地與新加坡，對典當與中藥產業的初步分